

- [23] 罗伯特·B.卡普兰,小理查德·B.巴尔道夫.太平洋地区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规划[M].梁道华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27-28.
- [24] 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0(3):79-98.
- [25] 博纳德·斯波斯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02.
- [26] 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4.
- [27] 马戎.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几点思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1):6-18.
- [28] 苏·赖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M].陈新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3.
- [29]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6.
- [30]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109.
- [31] 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M].徐鹤林、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25.
- [32] 王浩宇.民族交融视域下的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4):16-22.
- [33] 博纳德·斯波斯斯基.语言管理[M].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38-239.
- [34] 韩礼德.语言与教育[M].刘承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04.
- [35] 朱跃,朱小超,鲍曼.语言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
- [3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35.

【论 文】

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同研究¹

——基于云南民族地区的抽样调查研究

焦开山、郭靓雯²

提要:文章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基于最新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显著相关。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显著影响其国家认同水平,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越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就会越高。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其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中存在差异。

关键词: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国家认同

一、问题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当前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方针[1],也是实现

¹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² 作者:焦开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郭靓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表现就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2]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阐释及研究过程中，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语言文化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作用。^[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4]（P.268）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①，是国家语言生活最重要的知识信息交流传播工具^[5]，推广好、普及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②。将普通话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旨在强调其在正式官方场合的通用性，在不同方言、语言地区的通用性。^[5]因此，深入研究各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多元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语言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关于语言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首先，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语言与国家认同之间具有重要的关联，“民族和社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建立和维持的”^[6]。语言不仅具有人际沟通的功能，而且具有身份标志的功能，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往往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手段之一。^[7]其次，目前学界在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具体关系上并未达成共识，少数民族群体在不同场合是否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是增强还是削弱国家认同尚存争议。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及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拥有不同语言背景的社会群体在不同情境下使用不同语言的情况更为频繁^[8]，这种情况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最后，目前学术界对语言与社会认同或国家认同关系研究，大部分依旧处于理论层面，相关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

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情况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对国家的认同，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进一步建构或强化其国家认同。基于此，本研究利用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

二、文献综述

“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多文化国家，无论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还是新近建立的国家，国家认同都是一个长期存在、举足轻重且随时代不断变化的问题。”^[9]它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又是治理现代化的心理基础。^[10]从公众个体角度讲，“国家认同是可变的”^[11]。基于此，探索公众国家认同的建构性成为持续的研究主题。

在所有影响国家认同因素中，语言是重要的因素。在结构观看来，“群体”具有某些固定的本质要素，语言被视为特定群体认同的象征^[12]，也是群体成员身份的特性标识。一方面，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塑造个人和群体的价值、心理、文化和历史背景；另一方面，语言是获得群体成员身份资格^[13]的重要要素，具有身份认同的功能。在社会建构视角看来，语言与社会认同之间是相互构建和动态变化的。社会认同既不是社会结构的附属品，也不是个人内意图的产物，而是在社会文化历史条件和互动情境中与语言互为建构的，它是一个多元、流动的过程^[14]。个体可以通过语言主动选择、表达及强化自己的社会认同。以往经验研究表明，我国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国家通用语言的文化认同价值和工具实用价值都有较高的认同度，对国家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政策也持积极态度^[15]。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具有更加明显的“工具性”，国家通用语言不仅是人际沟通的工具，而且也是升学求职并尽快融入社会的重要手段^[16]。

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环境较为复杂，个体往往根据所处的多维社会语言互动情境使用不同的语言，表现出复杂的认同。以往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但二者在具体关系上并未达成共识。有研究认为，少数民族群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会增强国家认同。社会成员的语言选择会依附于社会群体的权力结构，如果外部权力结构（如国家）过于强大，那么少数民族或群体就会选择服从于这个权力结构的安排[17]。在许多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体在习得优势语言后就不再进行频繁的语言转换活动，他们更愿意保持使用优势语言并认为其获得的国家认同比本群体认同更为重要^[17]，也更倾向于选择适应外部生活。不过也有研究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少数民族群体会在语言差异中建构民族差异，进而削弱国家认同。随着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功能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人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感也会不断增强。当民族认同对于个体而言变得重要的时候，个体往往会通过语言差异来标榜自己并给予本民族语言较高评价，从而不断强化本民族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18]。

从实证研究结果看，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和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拥有不同语言背景的社会群体进行着密切的接触和交往。有研究发现，受国家通用语言熟练程度的调节作用，人口流动影响国家认同，对于懂得国家通用语言的公众，人口流动对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随其熟练程度的提升而增强^[19]。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语言使用状况呈现多语化趋势，即和家乡人说家乡话或民族语言，在公共场合说国家通用语言^[8]。也有研究认为，当前社会不同群体“向国家通用语言靠拢”并非消除方言或民族语言，而是将其局限于特定的交际空间和交际人群^[20]。从交际人群看，人们会根据关系远近选择不同的语言变体。与亲戚等亲情圈的人谈话时，居民往往转用家乡话；与同事和其他民族的朋友、陌生人等社交圈的人谈话时，居民一般选用国家通用语言^[21]。当交际空间为公众场合时，居民选择国家通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比率增加；而置身于较为封闭、私人的场合时，居民选择国家通用语言比率会下降。对于个体在方言或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中频繁转换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需要我们进一步实证研究。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发现，一方面国内学术界虽然对语言与社会认同或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依旧处于理论层面，相关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在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具体关系上并未达成共识，而且对个体在方言或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中频繁转换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需要我们进一步实证研究。鉴于此，如图1所示，本文一方面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考察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另一方面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不同的条件下，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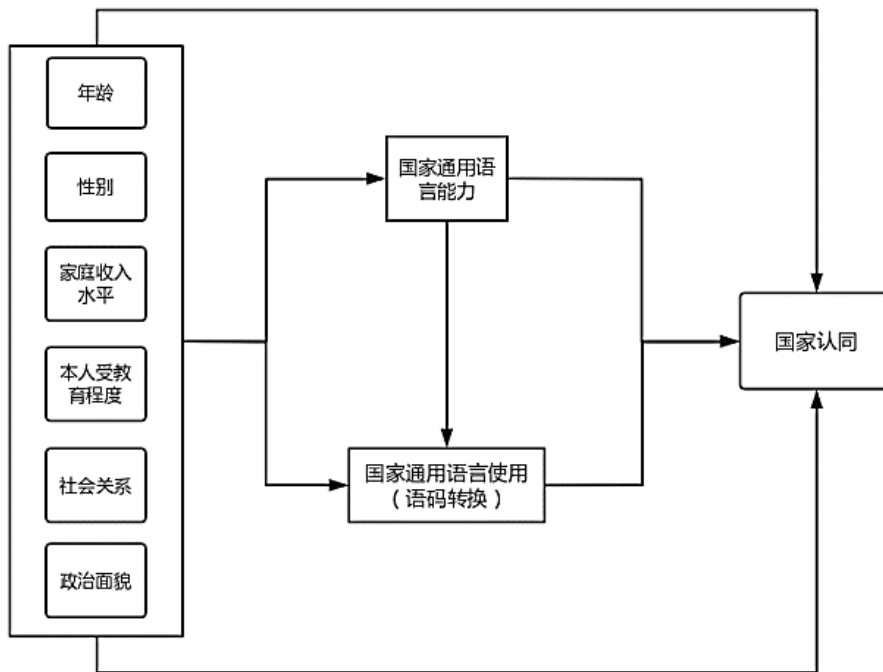


图1 本文的研究框架

三、数据和方法

(一) 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8年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抽样调查。本次调查把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于等于云南省平均水平(33.39%)的县(区)定义为抽样的总体,总共69个县(区);然后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了160个村(居)委会,在每个被抽中的村(居)委会中,按照系统抽样的方法抽取25户家庭;最后,在被抽中家庭的成年人中随机抽取一名成年人进行访问。在剔除汉族样本和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量为2244人。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包含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样本。

(二) 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包括个体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等,它描述的是个体对所属国家的感情强度和依恋程度,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忠诚、爱以及关心。根据受访者对以下关于国家的看法与感受四个问题的回答结果进行测量:(1)我曾花时间去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传统和习俗;(2)当别人批评我们国家的时候,我觉得像在批评自己;(3)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4)我每次听到国歌的时候会很激动。每个问题有4个选项,分别是“不符合”(编码为1)、“一般”(编码为2)、“比较符合”(编码为3)和“非常符合”(编码为4)。由上述4个问题构成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值为0.75,信度较高,可以用于构建一个国家认同综合指数。本研究首先用这四个测量指标拟合一个等级项目反映模型(Graded response model),然后根据此模型计算一个国家认同感指数变量^③。这个变量值越高,说明国家认同感越强烈。

本研究对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测量包括听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说国家通用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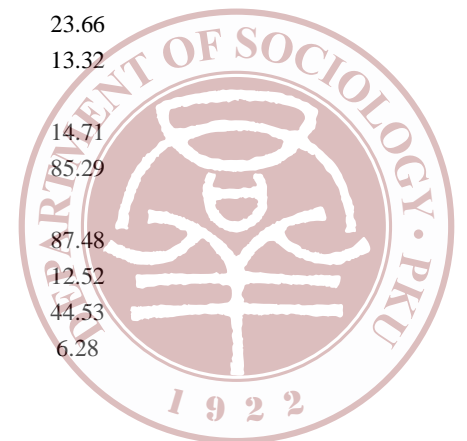
言能力。首先采用李克特量表对每个方面进行测量，其中 1=非常差，2=差，3=一般，4=好，5=非常好。然后对个体听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计分和说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计分进行加总，总和作为个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取值范围在 2 分到 10 分之间。

本研究对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测量，侧重于在日常生活中少数民族群体是否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如果受访者在与家人交谈、朋友聚会两种情境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则为有（编码为 1）；如果在上述两种情境下都没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则为无（编码为 0）。

考虑到社会经济因素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这些因素可能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或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本研究将收入、教育、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根据样本的四分位数，把家庭人均年收入总共划分为四个等级：低（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样本的 25% 分位数，编码为 1）、中低（家庭人均年收入在样本 25%-50% 分位数之间，编码为 2）、中等（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50%-75% 分位数之间，编码为 3）和中高（家庭人均年收入高于样本 75% 分位数，编码为 4）。受教育水平被划分四个等级：文盲/半文盲（编码为 1）、小学（编码为 2）、初中（编码为 3）、高中及以上（编码为 4）。政治面貌分为两个类别：群众（编码为 0）、中国共产党党员（简称“中共党员”，编码为 1）。社会关系根据受访者是否有亲属在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工作的回答结果分为两个类别：有亲属在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工作则被认为在政府里有关系（编码为 1），没有任何亲属在县级及以上部门工作则被认为在政府部门没有关系（编码为 0）。本研究的自变量还包括性别、年龄变量。其中性别是二分类变量，男性编码为 1，女性编码为 0；年龄是时变变量，取值范围在 18 岁到 83 岁之间。

表 1、变量测量及其分布（N=2244）

	计数	百分比（均值）
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无	1434	63.90
有	810	36.10
性别		
男性	1293	57.62
女性	951	42.38
本人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458	20.41
小学	868	38.68
初中	685	30.53
高中及以上	233	10.38
家庭收入水平		
低	760	33.87
中低	654	29.14
中等	531	23.66
中高	299	13.32
社会关系		
有亲戚在政府部门	330	14.71
没有亲戚在政府部门	1914	85.29
政治面貌		
群众	1963	87.48
中共党员	281	12.52
年龄	2244	44.53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2244	6.28



（三）分析方法

为了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拟合两个 logistic 回归模型。在模型 1 中，只加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控制变量。然后在模型 1 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变量，得到模型 2。通过比较模型 1 和模型 2，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否对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具有显著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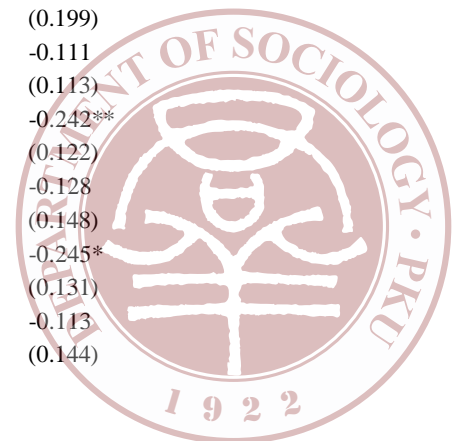
为了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本研究拟合四个线性回归模型。首先，在线性回归模型 1 中，只加入控制变量；其次，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变量，得到模型 2，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否对国家认同有显著影响；再次，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变量，得到模型 3，考察国家通用语言是否对国家认同有显著影响；最后，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使用的交互项，得到模型 4，考察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因素的调节。全部模型用 STATA 16 进行估计。

四、研究结果

表 2 为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由模型 1 可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最重要因素，与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文盲/半文盲群体相比，受过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发生比分别高出 51%、66% 和 221%。通过综合比较模型的拟合度（卡方值=11.16，自由度=1，P=0.001），模型 2 是相对较优的模型。根据模型 2，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具有显著影响，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发生比约高出 10%。

表 2、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参照类）	国家通用语言使用	
	模型 1	模型 2
男性（女性）	-0.130 (0.092)	-0.132 (0.092)
年龄	-0.001 (0.004)	0.003 (0.004)
小学（文盲）	0.412*** (0.130)	0.336** (0.132)
初中（文盲）	0.505*** (0.142)	0.352** (0.150)
高中及以上（文盲）	1.165*** (0.189)	0.961*** (0.199)
中低收入（低）	-0.101 (0.113)	-0.111 (0.113)
中等收入（低）	-0.214* (0.122)	-0.242** (0.122)
中高收入（低）	-0.077 (0.147)	-0.128 (0.148)
有亲戚在政府部门（没有）	-0.221* (0.131)	-0.245* (0.131)
中共党员（群众）	-0.041 (0.142)	-0.113 (0.144)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0.099*** (0.030)
截距	-0.783*** (0.226)	-1.456*** (0.305)
样本量	2244	2244
对数似然值	-1442.486	-1436.904
自由度	10	1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表 3 为国家认同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从模型 1 的估计结果看，性别是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与女性群体相比，男性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平均高 0.036。受教育程度对国家认同也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国家认同水平也会相对较高。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文盲/半文盲群体相比，受过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要分别高出 0.049、0.096 和 0.145。家庭收入水平对国家认同具有显著影响，与低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要分别高出 0.018、0.029 和 0.042。社会关系同样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有亲戚在政府部门的少数民族群体比没有亲戚在政府部门的国家认同指数平均高 0.024。政治身份同样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中共党员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平均比非党员群体高 0.051。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变量，模型决定系数从 0.105 升至 0.115。根据嵌套模型的似然比率检验结果（卡方值=25.26，自由度=1，P=0.000），模型 2 优于模型 1。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国家认同水平也相对越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认同指数平均增加 0.013。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变量，其决定系数升至 0.118。通过模型 3 和模型 2 的似然比率检验结果（卡方值=6.87，自由度=1，P=0.009），模型 3 优于模型 2。因此，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其国家认同指数比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平均高 0.021。

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交互项，其决定系数升至 0.119。通过模型 4 和模型 3 的似然比率检验结果（卡方值=3.90，自由度=1，P=0.048），模型 4 优于模型 3。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估计为-0.009，且在 0.05 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

表 3、国家认同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参照类）	国家认同指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男性（女性）	0.036*** (0.008)	0.036*** (0.008)	0.037*** (0.008)	0.036*** (0.008)
年龄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小学（文盲）	0.049*** (0.011)	0.039*** (0.011)	0.038*** (0.011)	0.037*** (0.011)
初中（文盲）	0.096*** (0.012)	0.076*** (0.013)	0.074*** (0.013)	0.073*** (0.013)
高中及以上（文盲）	0.145*** (0.016)	0.119*** (0.017)	0.114*** (0.017)	0.115*** (0.017)

中低收入（低收入）	0.018*	0.017*	0.018*	0.017*
	(0.010)	(0.010)	(0.010)	(0.010)
中等收入（低收入）	0.029***	0.025**	0.026**	0.027**
	(0.010)	(0.010)	(0.010)	(0.010)
中高收入（低收入）	0.042***	0.036***	0.036***	0.037***
	(0.013)	(0.013)	(0.013)	(0.013)
有亲戚在政府部门（没有）	0.024**	0.021*	0.022**	0.022**
	(0.011)	(0.011)	(0.011)	(0.011)
中共党员（群众）	0.051***	0.042***	0.042***	0.042***
	(0.012)	(0.012)	(0.012)	(0.012)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0.013***	0.012***	0.015***
		(0.003)	(0.003)	(0.003)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不使用）			0.021***	0.076***
			(0.008)	(0.029)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0.009**
				(0.004)
截距	0.417***	0.332***	0.328***	0.311***
	(0.019)	(0.026)	(0.026)	(0.027)
样本量	2244	2244	2244	2244
决定系数	0.105	0.115	0.118	0.11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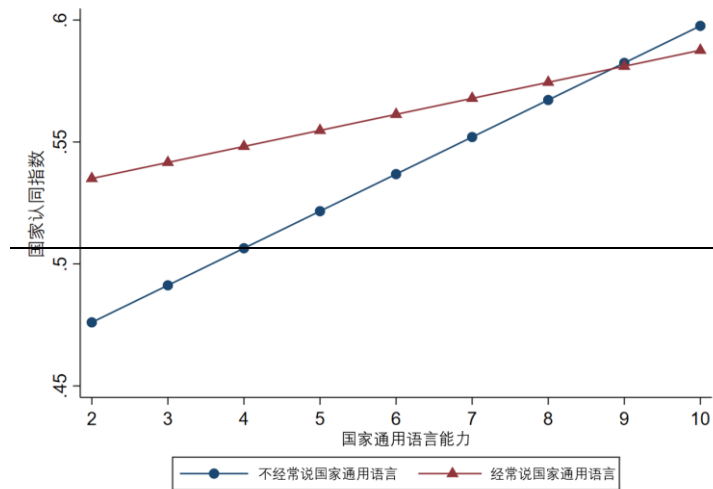


图2、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语码转换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情况

图2是根据模型4绘制的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随着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其次，在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差异较大，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显著高于不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群体，两者之间差距较大；但随着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和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在国家认同指数的差异在缩小。最后，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和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相差不大。换句话说，拥有较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少数

民族群体，即使不经常说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水平也会较高。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为9分时，二者的国家认同指数几乎相同。

五、结论与讨论

语言不仅仅是人们沟通的工具，更是群体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是一大特点。因此，深入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增强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以及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社会交往中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第一，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之间呈正相关，即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其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更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交流。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以往研究认为，某种语言的使用者越多，其表达能力和适应能力越强，使用者发生语言转换的可能性就越大^[22]。随着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逐渐超过本民族语的使用能力，便容易形成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本民族语为辅的语言使用格局^[23]。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影响力和工具作用明显高于少数民族语言，拥有较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体倾向于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第二，本研究结果显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多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年龄相对年轻、社会流动相对频繁及社会交往范围相对较广者，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机会也相对较多。这一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以往的一些理论观点。少数民族群体在不同情境使用不同语言并非轻而易举，它是先在自我意识基础上改变自我，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为了避免承担额外的负担，人们通常不会轻易选择改变自我，除非这种改变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好处^[17]。对于少数民族群体中年龄较大者来说，重新学习新的语言已经无法使他们的生活再发生实质性的改善，而年轻人为了谋求更大发展更愿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第三，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其国家认同水平呈正相关，即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其国家认同水平越高，这与以往研究一致。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首先，在信息获得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有着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和通用性。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强的少数民族群体可以拥有更广泛的信息渠道，了解更多国家整体发展的信息，产生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其次，在文化教育方面，拥有较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体有机会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如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大学教育。他们既可以获得更高的学历和社会阶层地位，也可以接受到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切实地体会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发展，促进其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提升。最后，在社会身份上，少数民族群体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更重要的在于可以使其具备融入主流社会生活的成员资格^[17]。语言是社会群体认同的象征，是群体成员身份的特性标识。少数民族群体具备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仅代表其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也代表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

第四，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水平呈正相关，他们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越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就越高。这一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以往的一些理论观点。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体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中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可以使其获得与社会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平等充分地参与国家生活，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机会。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体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会扩大其活动和社交范围，更便捷地与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和国家认同感。由此可

见,少数民族群体通过国家通用语言的频繁使用,不仅会不断增强其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化价值和工具性实用价值的认同,也会不断增强其对国家的认同。

第五,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关系在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可以显著提升其国家认同;但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强的群体而言,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与否对其国家认同并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在增强国家认同上发挥着不同作用。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起着基础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能有效增强其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增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起到辅助作用,尤其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强的少数民族群体更是如此。基于本研究发现,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高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为其创造一个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使其获得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和锻炼机会,也可以使其更深地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功能,从而增强其对国家通用语言和国家认同。综上所述,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尤其是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当前不仅要推进各级学校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而且要进一步创造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增加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通用语言使用频率,从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国家认同是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包括心理、文化、社会、政治等多个维度。本研究对国家认同测量侧重于心理和文化维度,而对政治维度测量和考察不足。因此,本研究结论不适于讨论一些与政治相关议题。其次,虽然本研究考察了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但是对于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个体而言,其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具体情境和含义也各不相同,这些差异都会影响到其相互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再次,关于国家认同是否会影响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需要进一步探究。最后,本研究数据来自于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其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注释:

- ①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本文所说“国家通用语言”指的是“普通话”,采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称法,兼顾了实用性因素和象征性因素,对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也包括海外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具有重要作用。参见王晖《论国家通用语言及其推广的“时度效”》,《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4期。
- ②2020年9月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巴特尔赴中央民族大学看望慰问各族师生的讲话。参见《巴特尔强调:学习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的共同责任》,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网,2020, <https://news.muc.edu.cn/info/1011/18297.htm>。
- ③根据模型计算的国家认同感指数变量是一个所谓的潜变量,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正态分布。关于此模型的具体介绍,可参见 R.J. D. Ayal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tem Response Theor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8。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2] 焦开山, 包智明. 新时代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 民族研究, 2019(4).
- [3] 胡艳霞. 增强语言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 2020(4).
- [4] 国家民委编.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5.
- [5] 周庆生. 语言与认同国内研究综述[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1).
- [6] Gumperz, J. (Ed.).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Studies in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7] 田鹏. 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失误与思考[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3(1).



- [8] 张荷. 广州市外省务工人员语言态度、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
- [9] 马得勇. 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J]. 世界民族, 2012(3).
- [10] 彭斌. 理解国家认同——关于国家认同的构成要素、困境与实现机制的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7).
- [11] McCrone, D.B., Frank. *Understanding National Identity: List of tabl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2] 高一虹, 李玉霞, 边永卫, 从结构观到建构观: 语言与认同研究综观[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8(1).
- [13] 王锋, 论语言在族群认同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0(4).
- [14] Harklau, L. From the “Good Kids” to the “Worst” [J]. *Tesol Quarterly*, 2000(1).
- [15] 黄行. 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2(3).
- [16] 王远新. 青海同仁土族的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9(5).
- [17] 叶君. 语言、社会认同和少数民族[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2).
- [18] 王浩宇. 民族交融视域下的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9(4).
- [19] 刘元贺. 人口流动、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基于 2018 年新疆城乡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4).
- [20] 陈建伟.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居民的语言选择和文化认同——以苏州回族为例[J]. 中州大学学报, 2011(6).
- [21] 武小军. 流动人口的言语接触与语言认同[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3(6).
- [22] 李怀宇. 浅论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转用[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4).
- [23] 袁焱, 许瑞娟. 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及特点研究[J]. 学术探索, 2013(5).

【编者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20 年秋季学期开设《民族社会学导论》本科选修课, 学生提交的期末作业涉及了与民族问题相关的多个议题, 本期《通讯》选取了三篇作业, 介绍给读者。 (马戎)

【学生课程作业】

语文课本如何建构民族意识?

——对部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分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本科生 王朗宁

义务教育是我国公民必经的社会化过程, 对教材的学习是我国当前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实质性的核心。在课程社会学视野中, 教科书作为承载合法性知识的文本载体, 通过教师的讲授被学生吸收和内化, 从而完成社会普世知识的代际传递。然而教材文本的内容并非天经地义——“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正如斯宾塞之问¹所提示的, 教科书的编写是一个带有意识形态的社会过程, 如劳顿 (Lawtown) 所说, 是“从一定社会的文化中选择出来的材料”²。教科书文本传达了社会规则对公民的要求, 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权力分配和主流话语; 因而我们能从教科书的结构和内容反观主流社会如何对知识进行筛选和叙述。这对观察我国民族问题的社会认识而言是一个尤其精巧的切口。

“民族 (nation)” 一词作为跨语际文化实践的产物, 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开始, 深刻影响了

¹ 杨明全: 《当代课程比较话语分析研究》,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第 77 页

² 转引自吴康宁: 《课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上海教育科研》, 2002 年第 9 期, 第 4 页

